

K877.402

20112

3



總主編 劉澤民

執行總主編 李玉明

三晉石刻大全

● 晉中市壽陽縣卷

主編 史景怡



山西出版集團
三晉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 / 劉澤民, 李玉明總主編; 史景怡分冊主編. —太原: 三晉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57-0178-4

I. 三… II. ①劉…②李…③史… III. 石刻 - 壽陽縣 - 圖錄 IV. K877.40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9)第236038號

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

總主編: 劉澤民

執行總主編: 李玉明

本卷主編: 史景怡

責任編輯: 呂文玲

責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者: 山西出版集團·三晉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編: 030012

電話: 0351-4922268(發行中心)
0351-4956036(綜合辦)

E-mail: sj@sxpmg.com

網址: http://sjs.sxpmg.com

經銷者: 新華書店

承印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開本: 787mm×1092mm 1/8

印張: 120.75

字數: 500千字

版次: 2010年4月 第1版

印次: 2010年4月 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57-0178-4

定價: 580.00元

ISBN 978-7-5457-0178-4



9 787545 701784 >

《三晉石刻大全》編纂委員會

顧問:薛延忠 申維辰 申聯彬 高建民 胡蘇平
張平 李立功 王庭棟 白清才 郭裕懷
李學勤 姚奠中 張正明 劉江 張領

主任:劉澤民
常務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羅廣德 李茂盛 張國祥 劉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澤俊 劉緯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趙望進 楊子榮
儲仲君 郭雙威 梁俊明 趙華山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敏政 石金鳴 史耀清 李小強 李堯 李非
吳廣隆 高可 陳長祿 張鴻仁 崔正森 董占鎖
董瑞山 齊榮晉 潘孝忠 劉光彥 霍潤德

總主編:劉澤明
執行總主編:李玉明

副主任編:羅廣德 李茂盛 楊子榮 張繼紅 落馥香

審定:山西省地方志辦公室

《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編纂委員會

顧問:李永宏 張璞
主任:劉志宏 李年善
執行主任:楊二懷

成員:溫毓誠 張定邦 王敏政 張晉平 李文藝 周麗萍
晉華 郭紹華 武志遠 陰崇民 郭潤生 王俊山
武增亮 葛鳳英 李文端

編審:張晉平 晉華

《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編纂委員會

主任:黃耀春
副主任:郝鵬鴻 潘曉林
執行主任:侯成元

成員:郭磊石 李二平 李增福 趙源 馬巨福 張林義
段培斌 郭志珍 弓有芳

主編:史景怡
副主任編:黃耀春 郝鵬鴻 侯成元
編輯:弓有芳 郭志珍

拓本:吳建國 王銀海 劉悅光 王祥瑞 祁石 要建國
點校:王伯華 弓有芳

碑文抄錄:祁石 郭鶴昌
實地拍攝:劉悅光

拓本拍照:李斌 賈瑞清 周春來
校訂:李碧桐 李陞 傅惠成 武代玲 李麗萍

凡 例

一、以搶救和存史爲收錄原則。收錄範圍：新中國成立前後凡在《三晉石刻總目》中存目并補充遺漏和新發現的現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錄。其中布施碑，根據歷史、文化價值并有助於當地古代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原則，慎重選擇收錄。收錄上下限：上限從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爲止。

二、以縣(市、區)分卷，原則上每縣(市、區)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臺山卷、晉商會館卷和總目各一卷。

三、概述爲一個縣(市、區)或石刻收藏單位總論性的文章，既有資料性，又有學術性，內容主要包括：石刻歷史發展(收藏)演變情況、現在分布區域、類別、時代、數量和保存情況、重要石刻簡述、主要特色和價值評估、保護和利用建議等。

四、石刻單位稱謂：各類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稱“通”；石碣(或刻石)稱“塊”或“方”；經幢(包括石幢)稱“尊”；墓誌和墓誌銘，有蓋的稱“盒”，無蓋的稱“方”；畫像(圖像)石、匾額、塔銘、法帖，稱“方”或“塊”；摩崖題記，稱“處”或“條”；石柱，稱“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稱“通”，刻在碣上的稱“方”或“塊”。石刻錄文稱謂：碑，稱“碑文”；碣(刻石)，稱“碣文”或“刻文”(鐫刻詩賦的，稱“詩文”)；造像碑(含座)，稱“發願文”；墓誌和墓誌銘，稱“誌文”；石匾，稱“匾文”(鐫刻帝王詔令的，稱“敕文”)；摩崖題刻、畫像石、石幢(內容非經文者)、石柱等，稱“題記”或“題刻”；經幢，稱“經文”；塔銘，稱“銘文”；墓表，稱“表文”；石對聯，稱“聯文”；戒(度)牒，稱“牒文”；法帖，稱“帖文”。

五、不設篇、章、節，一件石刻獨立成篇。以縣(市、區)爲綱，按鐫立年代爲序，不分類。年代不詳者，則據碑文推算其大體年代，附於相近年代之後。排序不當者，以碑刻時間爲準。

六、每篇內容一般包括石刻名稱(全稱)、簡介、石刻錄文(全文錄入并斷句)。元代(含元代)以前的石刻每通(件)配黑白照片或拓片若干張(全景和特寫)，明清以後石刻遴選重要者配拓片和照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簡介”中首先介紹人物的生卒年、籍貫、主要官職、生平事迹、著述等，然後再簡介石刻。

八、凡涉及人物籍貫的，一律用原地名，括號內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九、新中國成立以來，有不少石刻陸續由原址搬遷到异地，這部分石刻均以現收藏單位收錄。地址一律按原址書寫，然後注明搬遷時間和地點。

十、有疑問或斷代暫無定論的石刻，可沿用舊說或存疑；有幾種說法的，諸說并存。

十一、紀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歷史紀年，括號內注明公元紀年。如唐貞觀元

年(627)。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律用民國紀年,括號內注明公元紀年。

十二、表示體積、面積等尺寸的,用厘米。如長(或高)120、寬60、高80厘米。

十三、每卷收錄的石刻文字,祇作標點,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錯別字、異體字、通假字等,保持原貌,一般不作甄別。

十四、石刻文字漫漶、剝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殘泐勉強可辨不確之字,以較小的字寫在方框□內區別之;闕佚過多無法計數者則以“闕”表之。

十五、索引按類編排,使本書既可按歷史順序檢索,又可按類檢索,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總序

李玉明

石刻,指鑄刻有文字的歷代碑、碣、造像碑、經幢、石幢(內容非經文者)、摩崖題記、墓誌銘、畫像石等,是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

石刻,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理解。狹義的理解,專指“碑”;廣義的理解,包括碑、墓誌、造像等各類刻石。

所謂“碑”,漢以前就有了,但那時的碑不是為了刻字,而是立於宗廟、學校,用以觀日影、記時刻、測方向的。古代禮儀規定,主人迎賓進宗廟之門要當碑而揖。祭祀時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犧牲先拴於碑上。碑在古代還有另一種用途,就是立於墓前用於下葬,稱為“窆石”,下棺時用以固定轆轤。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稱之為“碑穿”,用以系繩下棺,宗廟之碑則為系犧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並非為了刻字,而是實用。

現代意義上的“碑”,興起於西漢而盛於東漢。原來在西漢以前,即商周時期,歌功頌德的文字鑄刻在鐘鼎彝器上,西漢開始以石代金,用碑記載功德和事件了。這即是金石銘文的由來。

從西漢“碑”開始鑄刻文字以來,歷朝歷代的碑刻大體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但各類碑之間又呈現繁多的樣式。碑頭有圭首、圓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長方形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龜趺形,形狀莊重,採用得最多。古人以龜為長久,常常以龜(實際稱赑屃)背碑。碑的內容有功德碑,記載文臣武將的文治武功;廟碑,種類繁多,記述廟的修建歷史;墓碑,記載死者籍貫、世系、事迹及卒葬時間等。還有記事碑、紀念碑、文告碑、詩文碑等。

從現代廣義上講,凡是鑄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稱為碑刻,而在先秦時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稱碑,而稱“刻石”。迄今我國發現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毀》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後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嶧山、泰山、琅琊臺刻石等。漢以後這些刻石逐漸統稱碑石了。佛教傳入中國和中國道教興起後,又出現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國中原地區宗教刻石最早產生和發展的省份之一,雲岡石窟、天龍山石窟,以及現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經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見證了這一歷史發展的軌迹。另外,作為墓碑衍化物的墓誌,起源於漢代,形制為長方形。而標準方形墓誌則興起於魏晉南北朝,大盛於唐,是碑刻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山西現存的北魏司馬金龍墓誌、封和龍、辛祥墓誌;北齊裴良、庫狄回洛、婁叡墓誌;東魏劉懿墓誌等。

石刻最大的特點,是能長久地保存下去,故稱為刻在石頭上的歷史,簡稱“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證史、補史和糾正官修書面歷史記載的舛誤,在弘揚民族文化,借鑒歷史經驗,在為社會主義政治、物質、社會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歷來受到地方當局、有關社會組織和個人愛好者的重視。例如,我國現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築五臺佛光寺東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調查發現後,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殿前鑄刻於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經幢,解決了該殿學術上的兩大問題。一是根據經幢的記載,該殿始建於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僅使該殿是唐代建築得到了有力的佐證,而且使這座國寶級文物建築有了準確的紀年,其學術價值大大被提升。二是從這幢經幢的記載中得知,佛光寺東大殿的施主(即捐資人)是長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寧公遇”。由於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築的級別也相應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現存一萬八千多處古建築,其每處建築的歷史沿革要麼文獻記載簡單,多數隻一句話,要麼查不到任何記載。而這些建築前前後後的歷史發展變化情況,主要靠現存碑刻的記載來解決,因而各座古建築附屬的碑刻就成了該古建築歷史沿革有力的證據。再例如,山西歷史上災荒不斷,元大德七年(1303)平陽、太原地區曾發生過山西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緒三年(1877)曾發生過山西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災,連續三年顆粒無收,死亡百姓不計其數,並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這些災荒,由於歷史的原因(如信息不暢),或是地方官員為保烏紗帽,有意隱瞞,因而文獻記載零碎簡單,甚至缺失無記載。而民間百姓在災荒過後却鑄刻了不少碑刻,使後人永誌不忘。這些災荒碑雖有不少毀於戰火,或被人為破壞,但各地保存

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為研究山西歷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災害的寶貴資料。除災荒碑外，存世的還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當地農林水利、醫藥等發展的重要實證。總之，三晉石刻是我省豐富多彩的一個重要人文資源，編輯出版《三晉石刻大全》，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有可資借鑒的現實意義，是功在千秋，蔭及子孫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興起金石學以來，訪求石刻是歷代衆多史學家、方志學家們的終生愛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創始《山西通志》時，就收錄了“金石”資料，現在能夠作為代表的是清光緒年間山西巡撫胡聘之主編的《山右石刻叢編》。這套《叢編》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錄北魏至元代計14個王朝840餘年的碑碣、墓誌銘等石刻720通（件）。還有在此之前於光緒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記》（單行本稱《山右金石記》），楊篤（秋湄）主編，收錄漢以來碑刻1550餘通。《山西通志·金石記》與《山右石刻叢編》比較，前者“有則錄之，存亡不計”，後者“存者收錄，亡者不述”。

山西歷史上最多時究竟有多少石刻，誰也說不準。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文物部門的多次調查和普查，山西現存各類碑碣大約兩萬。清代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在《語石》中說：“大抵晉碑皆萃於蒲、絳、澤、潞四屬。”四屬原都稱州，大體上是現在的運城、臨汾、晉城、長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區。《山右石刻叢編》收錄的720通碑刻，屬於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記》收錄的1550餘通碑刻，屬於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現存的兩萬餘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一半以上，葉氏的論斷基本是正確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區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樣應予重視。

新中國成立以來，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門和有關部門、組織以及個人愛好者，在石刻的調查、保護、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這些成果比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系統性；也沒有一個專門訪求石刻的機構，使這項事業的發展受到一定制約。其次，歷史資料少而缺失，已出版問世的神刻著作，存量極少，不僅難求，而且收錄不全。比如《山右石刻叢編》和《山西通志·金石記》均收錄到元代，且遺漏不少，大量明清時期的碑刻未被採擷，造成歷史的遺憾。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祇收錄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編》，祇收錄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大量的補遺拾缺工作。第三，新中國成立以來又新發現了大量的石刻，特別是新發現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誌銘、摩崖題記、造像碑等，大大豐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資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誌的出土、黃河沿岸等處漢以來漕運摩崖題記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發現，以及其他一大批新發現石刻的著錄登記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資料，這些都需要有人去進一步訪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的特點是不能再生性，毀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滅法，山西的漢碑及三國兩晉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毀。郭泰碑後來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無漢碑”的歷史遺憾。當前仍存在盜竊和建設工程中人為破壞石刻文物的嚴重現象，自然損毀也日益加劇，古老石刻隨時都有流失和被毀的危險。因此，搶救保護石刻，將其全部著錄在冊，世代流傳下去，是當務之急，是帶有搶救和存史雙重重要性質的宏大工程。

為了全面系統地開展三晉石刻的訪求和研究工作，三晉文化研究會成立以來，即借鑒歷史經驗，適應形勢的需要，挑起了保護研究石刻傳統文化這個重任。從1990年開始，即着手分市編輯出版《三晉石刻總目》，到2006年底，已有9個市的《總目》正式出版，共收錄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計16046通。在基本完成《三晉石刻總目》編輯出版的基礎上，從2007年正式開始編輯《三晉石刻大全》。《大全》以《總目》為基礎，將新中國成立前後的石刻，不論存佚，有文則存，全文抄錄，並斷句。同時，每篇加“簡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縣（市、區）1卷，省博物院和五臺山、晉商會館各1卷，再加記事總目錄1卷，全省預計125卷。

分步編輯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資料價值、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都將遠遠超過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將成為山西有史以來的首創之作，流芳後世，意義深遠！

是為序。

序 一

原晋中市人大副主任 楊二懷

昔聞“盛世修志，盛事勒石”。極言修志刻石之至要也。修志即紀史，史可鑒古知今，曉諭後人，但由於歷代史官自身的局限性或某些客觀原因，使有的史書中許多記載史料不實、不全，甚至存在明顯的差錯。一旦形成定論，以訛傳訛，貽害無窮。唯同一時期的石刻、碑碣等，由於其內容涉及面相當廣泛，幾乎囊括各個層面的各種社會狀況，且秉筆直書，史料翔實，可以證史之真偽，補史之不足，進而糾正史書之舛誤。歷史上通過碑碣、墓誌等刻石取得佐證，澄清史實，進而辨別真偽的疑案、懸案，不乏其例。由是，訪求石刻成為許多史學家、方志學家和文化學者的終身愛好，歷來為有識者所重視。

晋中市地處三晉腹地，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乃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文化底蘊極其深厚。境內文物古迹眾多，各類文化遺存十分豐富，僅就石刻而言，不僅門類齊全，而且跨越時間長，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晋中市三晉文化研究會在省三晉文化研究會的指導下，已陸續編纂了《晋中碑刻選粹》和《三晉石刻總目·晋中市卷》。前者輯錄選拓上自北魏下迄民國的各種碑刻共計463通，乃晋中碑刻之精粹；後者收錄與前者同一時期的各類石刻目錄計2474條（晋中市現存碑刻總量約在3000通以上）。雖不敢言已悉數收錄和發掘，但其不失為一筆寶貴財富，對挖掘、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文化晋中”建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目前已輯錄選拓的石刻、碑帖雖然數量不多，但多為珍品佳作，其中有些在全國都是極為罕見的，如明洪武年間的《新修十八盤并天井郊城堡圖碑》，明萬曆年間三彩琉璃燒造的《空王佛行宮碑記》和《空王殿建修碑》，唐代的《汾州抱腹寺碑》、《李光進神道碑銘并序》和《李光顏神道碑銘并序》等。此外，還有許多碑帖都是書法藝術價值極高的稀世珍品，如清初傅山隸書《郭泰碑》、清中期祁寯藻行書《祁氏支祠碑》、民國時趙鐵山楷書《太谷重修大觀樓記碑》、常旭春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刻石》等。然而，盡管如此，由於條件所限，仍有大量有價值的碑刻未被採擷，不能不令人引以為憾。所喜者，近年來由市三晉文化研究會組織各縣（市、區）分別遴選的一批精粹石刻，已陸續編錄出版。

在此基礎上，壽陽縣有志于此的同志們繼續整理和研究金石碑刻，從收錄、拓印、點校到編輯成書，幾位專家和老同志幾經寒暑，甘守寂寞，淡泊名利，不遺餘力，終於按照三晉文化研究會《三晉石刻大全》之編纂要求，編纂成《三晉石刻大全·晋中市壽陽縣卷》，走在了全市各縣的前頭，可喜可賀！其中甘苦，非親歷者所能察也。其精神令人欽佩，感銘至深。古語曰：有志者，事竟成。信哉斯言！

謹此數語，聊以為序。

序 二

壽陽縣人民政府縣長 郝鵬鴻

中國因有五千年文字可考歷史而聞名。石刻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是我國漢代以降兩千多年來特有的文化傳承方式，它集歷史、文化、書法、鑄刻於一體，補充、豐富了傳世文獻記載，反映了區域社會生活、風俗習慣以及國家、地方制度，對全面了解歷史，突出展示地域特色風貌，具有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

山西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歷代石刻浩繁薈萃，資源十分豐富。很多年來，這一資源一直處於散落、荒棄狀態，未能有效保護和利用。三晉文化研究會發起編纂的《三晉石刻大全》，是一項具有存史和搶救雙重性質的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在區域範圍和收錄整理規模上，堪稱空前。

壽陽地處山西中部，隸屬晉中，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繁衍生息，其建置歷史可以追溯至春秋，當時晉國設馬首邑，西晉太康中置縣。人文淵藪世續綿長，歷史底蘊深厚豐富。《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在晉中市的率先出版，得益於2007年原壽陽縣委書記史景怡主編的《壽陽碑碣》。本書在《壽陽碑碣》之基礎上，適當增刪石刻資料，共收錄石刻八百餘通（方），從東魏始，歷唐、宋、元、明、清，截止年代為公元2006年；種類包括碑碣、摩崖、題記、墓誌等十二大類。《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的成書，飽含了工作人員數年的心血和汗水，實屬不易。

《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以石刻之形式，折射出壽陽地域社會沿革和人民群眾的創造力。金石之聲，傳響千秋。傳承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鑒古知今，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體現，也是建設壽陽文化名縣戰略的有效舉措。今後要進一步加大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全面推進文化繁榮發展，打造壽陽文化名片，提升壽陽知名度，促進全縣經濟、文化和諧發展，為建設壽陽美好明天努力奮鬥。

概述

春秋時期，壽陽縣為祁氏邑，至公元前514年，晉分祁氏之田為七里，壽陽居其一，稱為馬首邑，韓固為馬首大夫。馬首邑是壽陽始建之縣，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兩漢時壽陽屬榆次縣地，至西晉太康初年始置壽陽縣，史料中亦有稱壽陽縣為“受陽縣”者。北魏時，北方游牧民族南移，壽陽被省入中都縣。太平真君九年(448)，徙壽陽之戶於大陵城南，即今文水縣境內，別置壽陽縣，史稱為西壽陽。史家稱原壽陽為東壽陽，因而這一時期的史料中又有東西兩壽陽之謂。其間於東魏至北齊間，朔州等州縣寄置於壽陽，故有“僑置五州十三縣”之稱。至隋開皇十年(590)西壽陽改為文水縣，又於原壽陽置受陽縣，後於唐貞觀十一年(637)改受陽縣為壽陽縣，從此壽陽縣名再未變更。從西晉壽陽建縣起直至唐初，史料中往往壽陽和受陽互見。了解了古代壽陽的這一段歷史，就可以知道，壽陽先民們飽受亂離之苦，壽陽縣是一個民族文化交融和民族大融合的地區。盡管如此，通過搜拓和整理壽陽碑碣資料，從中仍能發現這一時期的民族矛盾還是很尖銳、很突出的。總之，壽陽是一個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縣份。壽陽的地面文物眾多，石刻遺存豐富，文化底蘊深厚，文脈熠熠生輝。今搜拓碑石，雖惜其不存者尚多，但又幸其尚存者已收集在冊，可傳永久。特檢其各時期重要者略述如下。

北齊河清元年(562)的《庫狄順陽王墓碑》，記述庫狄回洛曾任“東壽陽大都督”，卒後，“葬於朔州城南”，佐證了關於朔州曾寄置於并州壽陽的記載，也說明了當時的朔州城就在今壽陽城。唐大曆二年(767)的《陽摩山功德銘文》石刻，記載了陽摩山於北魏武定年間即已有了佛事活動，並開始了摩崖石刻造像。大曆二年重建功德堂，是在李家皇帝關心下，由當時的“北京主”都知兵馬使、節度使、太原尹辛雲京主持重建的。唐天祐四年(907)的《神福山寺靈跡記》碑，記載唐代中期的居士李通玄卓錫方山，弘揚佛法，闡釋華嚴經要旨的事跡。李通玄傳世的《新華嚴經論》和《決疑論》等佛學著作成書於壽陽方山。自李通玄之後，方山逐漸成為五臺山佛教體系之一脈和華嚴宗人的重要活動地區。韓公亭詩碑刻的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晚年於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奉旨赴鎮州撫叛，路經壽陽時的題壁詩，後世步韻奉和此詩者甚多，並曾刻石，在舊縣志中占有相當比重。

宋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程顥、程頤，即明道、伊川二夫子，其未顯時，曾由南方回盂縣外氏家省親，道經方山之側，結茅讀書，讀書處今稱程子窟村。方山的《二程子祠碑》和《程子四箴碑》，是記述二程結茅壽北的史實和闡述二程理學名言之碑，由清代乾隆年間狀元潘世恩、禁烟先驅、太子太保湯金釗，文淵閣大學士晉武英殿大學士卓秉恬，上書房總師傅陳官俊，體仁閣大學士祁寯藻各書一碑，各呈書藝。《長者龕記》是方山僧人於政和八年(1118)請宋代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所撰，敘述張商英於元祐三年(1088)奉使河東，詣方山瞻仰李通玄像，在經駕中得見李通玄著論多種，遂頓悟華嚴宗旨，並囑僧人修葺寺廟，弘揚長者華嚴思想。《曾布題名石》是宋代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弟弟曾布，於元祐四年(1089)奉使北上，路經壽陽時詣方山謁李通玄像的題名碣。《方山昭化禪院牒》是宋崇寧二年(1103)宋朝廷對方山禪院發出賜李通玄為顯教妙嚴長者法號的官方聖旨文書碑。從此方山寺納入宋朝廷祠部格，如遇聖節，準許進奉功德疏，由尚書禮部敕命指揮施行。金代文學大家元好問，其第二故鄉平定州是他經常往來活動之所，他由平定回故鄉時必要路經壽陽，其間也必小住幾日，因而壽陽留存有他的詩文作品，如他撰寫的《壽陽縣新學記》碑，及《暫住西張》和《宿張靖田家》詩，皆載於縣志。他的詩文對壽陽後學產生過很大影響。

壽西鹿泉山及北神山與陽曲之阪泉山連山接嶺，實為晉中罕山一脈。古籍《列子》中記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左傳》上說，春秋時晉文公伐楚時進行龜卜，遇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兆，因而陽曲東山遂名阪泉山。《述異記》上說，秦漢時造角抵戲，演繹軒轅戰蚩尤的故事。今北神山、湧泉山、鹿泉山皆建有軒轅行祠，奉祀軒轅帝及護國將之像。壽西一帶民間至今還演角抵戲，群眾稱為“愛社”，是上古流傳的遺風餘韻。明代的《重修岐山寺廟碑》、《重修軒轅聖祖行祠記》碑、《增修護國將廟記》等碑，都是修葺軒轅行祠的廟碑。明代萬曆十九年，陝西人藍尚質任壽陽知縣時，見壽陽地寒，民不知織事，因而自出俸廉，購置紡織具，又從陝西雇傭織師，教民紡織，不僅解決了穿

衣問題，更主要的是實現了政通人和，稱得上是“當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光輝典範。清代咸豐年間，大學士祁寯藻曾為其撰寫了《藍公教織歌》，宣傳藍公的愛民政績，連同《藍公教織記》一并刻碑，立於藍公祠內。大學士、軍機大臣彭蘊章《奉和藍公教織歌》一碑也立於祠中，成為後世任職壽陽官員們學習的榜樣。壽西的五峰山寺廟，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的知名，主要仰仗於明代的道教雨師郭還陽和他的入室弟子傅山這兩個人。明萬曆時，郭還陽在五峰山開鑿龍池，為民祈雨，北方各省也多請其祈雨，名聲很大。明末，傅山在五峰山拜郭還陽為師，從其學藝，實則是以宗教為掩護，開展反清復明活動。傅山留在五峰山的筆迹甚多，其中以五峰山草書碑較為知名，國內圖書館及書法家多有收藏者。本世紀初，五峰山寺廟經過落架大修，恢復了原貌，並申報成為市級、省級和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終於使這一道教古建築重放異彩。今寺內有碑廳，貯碑甚多。壽陽縣城的古建築朝陽閣，始建於明代正德十二年(1517)，五百年間，代有重修，皆有重修碑記。朝陽閣是壽陽的標志性建築物，素有“錦州獅子應州塔，不敵壽陽朝陽閣”之謂，歷史上過往行人都要駐足觀賞，因而贊美朝陽閣的詩文甚多，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橫遭拆毀，縣人無不扼腕嘆息。本世紀初，在全縣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重建新閣，規模比原閣擴大百分之五十，臺基高度提升了三倍以上。如今的朝陽新閣，瓊樓碧瓦，聳立玉宇，更勝往昔。原縣委書記史景怡撰寫的《重修朝陽閣賦》，洋洋千餘言，極盡新閣之壯觀。該碑由書法家夏湘平書丹，更增添了新閣的光彩。新碑與舊碑共同見證了朝陽閣的五百年興衰史。

張穆是清代的一位學者，他既是一位愛國思想家和地理學家，又是一位編輯大家，同時還是一位書法名家，因而被人們稱為碩儒。他與壽陽相國祁寯藻既是姻親，又是朋友，在官場上則是祁的幕僚。盡管他祇活了四十五歲，但他在這有限的生命中，卻做出很多不朽的業績。他把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西北地理的考證和論著，因而獲得世人的贊譽。他與壽陽祁家交往的故事廣泛流傳在平定、壽陽一帶，他的著述、墨寶以及石刻等資料被珍存在壽陽的也比較多。人們把他當作壽陽人，喜歡他，尊敬他。他的石刻書法作品常被人們拓裱裝幀在鏡框中懸挂，他臨寫的顏真卿的《忠義堂帖》，連同翁方綱的跋文和祁寯藻的題記，共刻成二十八石，被輾轉保存於壽陽“益壽慶”字號的“了心亭”中，為人們所珍愛。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英國傳教士來到壽陽，名為傳教，實則推行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入教的教民則依仗洋人勢力欺辱同胞，與地方每有爭訟，矛盾日深。光緒二十六年，在全國風起雲湧的義和團運動中，壽陽人民也迅即匯入了這一波瀾壯闊的反帝鬥爭潮流中。在任慶芝、任錫明等人帶動下，成立了義和團組織，雲集縣城，專門以毀洋貨、滅洋人為己任，並殺死六十多名教徒。洋教士畢翰道等七人躲進縣衙要求保護，知縣秦錫圭將計就計，雇車將洋教士送往省城，巡撫毓賢將這七名洋教士與在省洋人一併正法，義和團人士歡呼雀躍。然而，好景不長，隨着清政府向洋人的妥協，義和團很快被鎮壓而失敗了。壽陽秦知縣被流放永不釋還，義和團首領被投入獄中，責令各縣為被殺教徒立碑，披麻戴孝，隆重發喪。壽陽現存的兩塊被殺教徒名錄碑，就是當年縣府所立。

一九三五年七月，中共山西工委遭到國民黨右派和閻錫山政權的破壞後，省委工作幾乎癱瘓，即派王文達主持省工委工作。一九三六年初，為了配合紅軍東渡抗日，王文達按中央關於向農村發展的指示精神，深入壽陽，找到經常在中共黨刊上發表文章的侯承璋作了一次長談。一九三六年三月，侯承璋召集李思源、張應魁等人在縣南的肥村小學校秘密成立了“中共壽陽支部”，侯承璋擔任書記。如今在肥村學校院內樹立的兩塊碑就是《中共壽陽支部創建紀念碑》和《中共壽陽支部紀念碑》，記載了壽陽黨組織的早期活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日軍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九月，朱德總司令和八路軍總部東渡黃河北上五臺。十月抵孟縣，十月二十五日，由孟縣白水村抵壽陽宗艾鎮，當晚在盤灣底村住宿，並召開了壽北抗日救亡工作座談會。朱總司令指示，要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政府和游擊隊進行抗日。二十六日，經縣城東到達景尚村住宿，二十七日，離開景尚村，抵和順縣馬坊鎮。朱總司令等在景尚住宿過的院落和窑洞，被辟為朱總司令路居紀念館，村中立有《朱德路居紀念碑》供人們瞻仰。二〇〇八年，朱德家人和秘書等人專程來到景尚，向紀念館贈送了朱德紀念像和部分書籍，成為紀念館的珍貴文物。

抗日戰爭時期，壽陽人民在縣委、政府的領導下，奮起抗戰。在種子坡村修建了近三千米地道，每家都留有地道口，野外留有多處瞭望口、射擊孔。地道內還有會議室、儲藏室，又有水渠直通水井，可防敵人用水灌。群眾形容說，地上有個種子坡，地下也有個種子坡。路北民兵曾依托地道，多次消滅進犯的鬼子。一九四七年九月，民兵利用

地道將進犯之國民黨四十九師一團打得暈頭轉向，丟下一片死尸，倉慌而逃。此次戰鬥受到中共冀晉二地委的通令嘉獎。如今種子坡地道已被辟為旅遊景點，地面立有《開發地道戰遺址功德碑》和《種子坡地道戰烈士碑》。

解放戰爭時期，劉胡蘭式的女英雄尹靈芝烈士為了保衛公糧、掩護群眾脫險，毅然決然地挺身走出山洞，走向敵人。她被俘後，被敵人折磨了十五個日日夜夜，受盡酷刑，堅貞不屈。不管敵人使用多少伎倆，靈芝始終就是三個字——“不知道”。敵人惱羞成怒，用燒紅的火柱燙她，用烙鐵烙她，用開水澆她，用水蘸麻繩抽她，把她折磨得血肉模糊，遍體鱗傷。她的右眼被打瞎，左脚被打骨折，已經奄奄一息了，敵人才下了最後毒手，將靈芝用鋤草刀鋤成三截。臨刑前，靈芝用最後力氣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靈芝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與幸福獻出了自己十六歲女共產黨員的寶貴生命。如今，在烈士的故里趙家壩村和太平村以及縣城，均建有尹靈芝烈士陵園，立有《尹靈芝烈士紀念碑》。在靈芝英勇就義地和靈骨埋葬地宗艾村，立有紀念標誌碑，靈芝同志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本書共收集石刻 604 宗，分 12 大類。其中：鄉約碑 7 宗，記事碑 161 宗，詩文碑 56 宗，廟宇碑 177 宗，經文碑 4 宗，標誌碑 28 宗，烈士碑 26 宗，教育碑 20 宗，墓誌碑 72 宗，楹聯碑 4 宗，題名碑 35 宗，摩崖碑 14 宗。所收的碑刻，數量最多的是廟宇碑和記事碑，在記事碑中有相當部分其實也是寺廟中碑。其次是墓碑和詩文碑。再次是題名碑、標誌碑、烈士碑和教育碑。除此之外，還有少量的摩崖石刻、鄉約碑、經文碑和楹聯碑等，總之是五花八門，豐富多彩。在這些碑碣中，我們看到了儒、佛、道三教文化的和諧交融，共同發展；看到了中國古代寺廟文化的繁榮景象，領略了春祈秋報、修廟唱戲和民間社火的鑼鼓喧鬧；也看到了古人對於教育、水利、種樹和社倉以及市場等方面的重視。同時，我們從烈士墓碑中體會到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眾多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了全國人民的徹底解放而獻出自己寶貴生命的英勇歷程。

碑刻是一種凝固的藝術，是一種文化的凝煉，也是一種歷史的積澱。壽陽碑碣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因而它對研究地方史志具有歷史的借鑒功能。它既可補充和糾正縣志中的不足和謬誤，又可供開展學術研究、譜牒文化研究、風土民情等民俗文化研究，同時還可作為書法藝術、詩詞、楹聯等藝術鑒賞和學習的資料。總之，這些碑碣是壽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壽陽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可以借鑒其蘊藏的歷史經驗，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更好地服務。

《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壽陽縣卷》編委會

二〇〇九年十月

目 錄

凡例	
總序	李玉明
序一	楊二懷
序二	郝鵬鴻
概述	編委會
·東魏·北齊·隋·唐·	
齊故定州刺史太尉公庫狄順陽王墓銘	北齊河清元年(562) (三)
齊故庫狄氏武始郡君斛律夫人墓誌銘	東魏武定三年(545) (六)
齊故郡君尉氏墓誌銘	北齊天保十年(559) (八)
陽摩山摩崖題記	東魏武定四年(546) (十)
金佛殿摩崖題記	隋開皇二年(582) (十一)
橫嶺摩崖題記	唐顯慶四年(659) (十二)
北榆摩崖題記	唐總章二年(669)至咸亨元年(670) (十三)
平舒崇福寺經幢	唐神功元年(697) (十五)
造像碑	唐 (十六)
金佛殿摩崖題記	唐開元八年(720) (十七)
西岢崇福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經幢	唐開元十年(722) (十八)
陽摩山功德銘文	唐大曆二年(767) (二四)
壽陽縣大樂山重修古楞伽寺碑記	唐元和六年(811) (二六)
古靈嵩寺新造功德堂記	唐元和六年(811) (二七)
神福山寺靈跡記并序	唐天祐四年(907) (二八)
方山摩崖大佛	唐 (三四)
·宋·金·	
雙林寺建造石塔座題名幢	治平三年(1066) (三七)
長者龕記	宣和二年(1120) (三八)
曾布題名石碣	元祐四年(1089) (三九)
太原府壽陽縣新修學記	元祐七年(1092) (四〇)
重修驛記	紹聖二年(1095) (四一)
楊謨題李長者舊居詩碣	紹聖二年(1095) (四二)
郭時亮詩碣	紹聖二年(1095) (四三)
祈雨碑	元符三年(1100) (四四)
李長者像碑	崇寧元年(1102) (四六)
方山黃龍泉石刻	宋 (四七)
方山赤龍泉石刻	宋 (四八)

方山月池石刻	宋		(四九)
方山黑龍泉石刻	宋		(五〇)
方山華嚴泉石刻	宋		(五一)
方山昭化禪院牒	崇寧二年(1103)		(五二)
方山昭化禪院政禪師行狀誌	崇寧二年(1103)		(五五)
貞逢原雪中游昭化院詩碑	崇寧三年(1104)		(五七)
方山普同塔	宋		(五八)
方山詩碑	金皇統元年(1141)		(五九)
王雷游方山詩碣	金大定三年(1163)		(六一)
謁無盡居士祠堂詩碣	金大定三年(1163)		(六二)
峪口吳家祖塋經幢	金大定十年(1170)		(六三)
西岢崇福寺彌勒像題記	金大定十三年(1173)		(六六)
蔣忠立墓誌銘	金大定十三年(1173)		(六七)
尖山寺廟盤龍柱			(六八)

·元·

壽陽縣新學記	至元二十七年(1290)		(七一)
重修雙鳳山五龍聖母廟記	延祐五年(1318)		(七三)
昭濟聖母腹中石幢	延祐五年(1318)		(七四)
石氏先塋之誌	至治三年(1323)		(七五)
刀村福田院創建正殿碑記	至順四年(1333)		(七六)
皇唐李長者碑	元統三年(1335)		(八〇)
故高義妻趙氏墓誌銘	至正二年(1342)		(八二)
詔旨務副趙景思墓誌銘	至正五年(1345)		(八三)
重修壽陽縣北山龍王廟記	至正十四年(1354)		(八四)

·明·

壽陽縣大樂山重修古楞伽禪寺碑記	正統十三年(1448)		(八九)
新建岐山湧泉公井樓之碑記	成化八年(1472)		(九一)
壽陽縣烏金山開花寺碑記	弘治元年(1488)		(九二)
重修雙林禪寺記	弘治三年(1490)		(九四)
重修城隍廟記	嘉靖三十年(1551)		(九六)
重修敕賜長壽山興善院碑記	弘治五年(1492)		(九七)
重修五龍堂記	弘治九年(1496)		(九九)
重修大明寺記	弘治十年(1497)		(一〇〇)
壽陽縣大樂山重修古楞伽禪寺碑記	弘治十七年(1504)		(一〇一)
重修岐山寺廟碑	正德五年(1510)		(一〇三)
創建朝陽閣記	正德十二年(1517)		(一〇四)
重修湧泉公廟碑記	正德十五年(1520)		(一〇七)
重修五龍王聖母殿碑記	嘉靖元年(1522)		(一〇九)
重修太安鎮關帝廟碑記	嘉靖四年(1525)		(一一一)
重修簡子廟記	嘉靖年間		(一一二)

新修觀音堂記	嘉靖五年(1526)	(一一三)
重修烏金山開花寺碑記	嘉靖十年(1531)	(一一四)
明承德郎李公墓誌銘	嘉靖十一年(1532)	(一一五)
肇造觀音堂記	嘉靖二十七年(1548)	(一一七)
壽陽袁氏先塋記	嘉靖二十八年(1549)	(一一八)
重修松坡佛殿碑記	嘉靖二十八年(1549)	(一一九)
重建唐韓昌黎文公祠記	嘉靖三十年(1551)	(一二〇)
游神福寺記	嘉靖三十五年(1556)	(一二三)
重修慶恩寺正殿碑記	隆慶元年(1567)	(一二四)
壽陽縣西安里蔡莊村重修烏金山開花寺碑記	隆慶元年(1567)	(一二五)
重修觀音寺記	隆慶六年(1572)	(一二六)
壽陽縣重修軒轅聖祖行祠記	萬曆元年(1573)	(一二八)
方山靈松岩摩崖石刻	萬曆二年(1574)	(一三〇)
方山金剛泉摩崖石刻	萬曆二年(1574)	(一三一)
重修長者廟記	萬曆二年(1574)	(一三二)
重修龍池助緣碑記	萬曆四年(1576)	(一三三)
馮邦定懿行碑記	萬曆五年(1577)	(一三四)
重修觀音堂記	萬曆九年(1581)	(一三六)
朝陽閣重金佛像碑記	萬曆十一年(1583)	(一三七)
朝陽閣孟蘭水陸會碑記	萬曆十一年(1583)	(一三八)
重修朝陽閣記	萬曆十一年(1583)	(一四〇)
啓建重修梵刹繪彩冥陽三番設會表行記	萬曆十二年(1584)	(一四一)
重修興福寺碑記	萬曆十二年(1584)	(一四三)
晉府香火院宗室題名記	萬曆十三年(1585)	(一四四)
重修遂興寺記	萬曆十四年(1586)	(一四五)
增修長者廟記	萬曆十五年(1587)	(一四六)
重修殿廟碑記	萬曆二十一年(1593)	(一四七)
龍天廟碑記	萬曆二十二年(1594)	(一四八)
重修觀音堂碑記	萬曆二十五年(1597)	(一四九)
昭化寺造經說	萬曆二十六年(1598)	(一五一)
增修護國將廟記	萬曆二十九年(1601)	(一五三)
太安鎮禱雨亭記	萬曆二十九年(1601)	(一五五)
白鹿寺山碑	萬曆三十六年(1608)	(一五六)
祈雨碑記	萬曆四十三年(1615)	(一五七)
明處士東泉馮公墓誌	萬曆四十四年(1616)	(一五八)
明安邑縣教諭閻季才墓誌銘	萬曆四十四年(1616)	(一六〇)
讓大師石坊	萬曆四十八年(1620)	(一六二)
重修朝陽閣并水陸等殿兼金塑聖像等項碑記	萬曆四十八年(1620)	(一六三)
方山納雲禪師塔銘	天啓元年(1621)	(一六四)
壽陽徐父母完赤德政垂澤永懷碑記	天啓三年(1623)	(一六七)
重建觀音殿記	明	(一六八)
五峰山龍池禱雨救民免糧碑記	天啓四年(1624)	(一六九)

大明國山西太原府壽陽縣昇平鄉郭村重修南神廟碑記	天啓七年(1627)	(一七二)
重修觀音堂金妝聖像碑記	崇禎元年(1628)	(一七三)
明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吳成美墓誌銘	崇禎二年(1629)	(一七四)
吳成美系譜碑	崇禎二年(1629)	(一七六)
重修洪山古寺碑記	崇禎三年(1630)	(一七七)
重修簡子正殿增補東西廟廡并鐘樓記	崇禎四年(1631)	(一七八)
榆次縣西北鄉等四村重修紫岩山華嚴寺西殿碑記	崇禎六年(1633)	(一八〇)
新建昭濟聖母洞記	崇禎七年(1634)	(一八一)
重修大明寺碑記	崇禎八年(1635)	(一八二)
新建關聖閣碑記	崇禎十一年(1638)	(一八四)
太原府壽陽縣太平鄉南康西三都段照村新建樓閣碑記	崇禎十二年(1639)	(一八五)
啓建新塑湖濱大王題名碑記	崇禎十四年(1641)	(一八六)
平頭禁牧碑	明	(一八七)
東郭義村古戲臺楹聯	明	(一八八)
興福寺殘碑	明	(一八九)
方山金鰲石刻	明	(一九〇)
方山觀砦石摩崖石刻	明	(一九一)
南東村石碣	明	(一九二)
雙林寺詩碑	明	(一九三)
東郭義村古廟石雕		(一九四)

·清·

重修關帝廟碑記	順治三年(1646)	(一九七)
重修朝陽閣右水陸殿記	順治三年(1646)	(一九八)
新建觀音碑記	順治六年(1649)	(一九九)
明大同儒學教授高可久墓誌銘	順治七年(1650)	(二〇〇)
興福寺新建碑記關聖大帝行祠	順治八年(1651)	(二〇三)
新閣補路碑記	順治十一年(1654)	(二〇四)
重修佛座題名碑記	順治十三年(1656)	(二〇六)
重修文廟碑記	清	(二〇七)
新建五花雲洞碑記	康熙十一年(1672)	(二〇八)
重修碑記	康熙十一年(1672)	(二〇九)
雙鳳山五龍泉石刻	康熙十一年(1672)	(二一〇)
重修將軍神廟碑記	康熙十九年(1680)	(二一一)
新建北極廟宇碑記	康熙十九年(1680)	(二一二)
重修雙鳳山聖母祠并新建寢宮龍洞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1684)	(二一三)
重修古刹昭化寺大殿西廊及妝塑諸佛神像記	康熙二十八年(1689)	(二一五)
重修方山古刹寺西齋神祠記	康熙二十八年(1689)	(二一八)
新建燈山碑記	康熙二十八年(1689)	(二一九)
重修金妝補塑地藏十王六曹神像新造聖龕題名記	康熙二十八年(1689)	(二二〇)
重修廟序	康熙三十年(1691)	(二二二)
重修聖母五龍寢宮碑記	康熙三十一年(1692)	(二二三)